

罗选民 著

文学翻译与 文学批评



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翻译与 文学批评

罗选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罗选民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02-005244-4

I . 文… II . 罗… III . ①文学 - 翻译 - 文集 ②文学评论 - 文集 IV . ①I046 - 53 ②I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415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周小滨

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

Wen Xue Fan Yi Yu Wen Xue Pi Ping

罗选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02-005244-4

定价 20.00 元

全球化视野中的翻译的文化转向(代序)

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贸易、金融或者是法律诸方面,而且给文化研究也带来巨大的冲击,文学、大众传媒、艺术等无不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得到新的诠释和新的整合。曾经处于边缘的翻译研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迎来了文化转向。东西方学者都认识到翻译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更多地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翻译是如何进行的?译者的理念对作品的选择有什么影响?翻译的过程是如何把握的?翻译是如何在文化的重构中发挥作用、如何被用来改造社会、改造文学的?

然而,在谈论“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问题时,我们要反思翻译这门学科为何在现代中国曾沦落为一门工具学科,其文化的属性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泯灭于种种功利性的追求之中。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文化翻译的理解只能是肤浅的和粗糙的。历史证明,能够产生影响的翻译活动,一定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根据记载,中国最初的翻译是《说苑》上《善说》篇所载鄂君译《越人歌》,其次是《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白狼王唐取等《慕化诗》三章。可它们在文学和历史上的影响几乎没有。何故?它们不能在文化层面得到阐释。故言翻译,学人会论及从后汉至隋唐的佛经翻译,言译家,要提到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翻译家,还是思想

家，其影响不仅仅在文本的层面，还贯穿在哲学、宗教、文学、史学之中。

梁启超说：“海禁既开，外侮日亟。”中国近代史满目疮痍，通篇写的都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西学大量引进，译学曾极盛一时。然而，当时所译之书，大都是枪炮工农艺之类，哲学等形而上的书籍极少。一些思想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等呼吁翻译要“形而上”，他们把西方政要和哲学摆在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位置。但时政要人以为，打败中国的，是西方的坚枪利炮，这种思想左右了当时的翻译。

当然，这种局面在二十世纪有所改观。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翻译研究主要停留在语言转换的层面，翻译优劣以技能来作为衡量标准。人们不断地探讨译文和原文的忠实问题，风格的重现问题，词汇的转换问题，句法的结构问题，等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并非不好，只是仅仅停留在语言学的层面就不够了。同样是从语言研究出发，刘禾的《跨语的实践》却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作者希望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性问题，她认为“翻译行为必然要介入某种语言的述行性之中，而这种语言限制着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或是为翻译行为的历史偶然性所限制。对于诸如此类述行的和述愿的言语行为或写作行为——复述、翻译、语境内外的引证，等等——的环境而言，任何高高在上或者超越这些环境而进行的历史化尝试，注定会导致所分析的观念、概念或者理论的僵化，其结果也必定会导致我们对历史实践的理解的贫困化。因此，我对‘现代性’的使用或者批判立足于一种引用的和翻译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的态度，真实地体现了翻译的精髓，与那些将翻译淡化、边缘化、从属化的行为相比，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之中，对西方的科学和人文的介绍都离不开翻译，因为，翻译不仅仅是述说什么，翻译

还通过自己的话语而行事，所以，翻译可视为独立于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以外的写作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刘禾在她的《跨语的实践》里说：“在分析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这一类有符号意义介入的表述形式的时候，我一直抵制着如下一种诱惑，即要么用外国影响要么用本土演进来解释变化，因为选择这一方式会过早地结束对问题的探讨，而实际上我们恰恰应当把它揭示出来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这个观念之所以有所助益，是因为它使我能够识别并诠释一些偶然的时刻与过程，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逻辑。读者将会注意到，影响我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选择与读解正是受跨文化诠释这一主导性问题意识，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本身。”这就是我们探索中国现代性的兴趣之所在，也是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标致性成果。

翻译的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当代文学批评。一些西方的文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如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区域研究、大众文化等视角来探讨翻译问题，翻译的内涵因此而扩大。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些翻译问题可以重新得到思考，一些翻译现象可以得到重新认识，一些译家可以重新得到定位。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文化的转向中，既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参与世界的译学对话，又要在文化的冲突中保持我们清醒的价值判断，凸现翻译的文化价值和功能。如对于西方喧嚣一时的“异化”研究，我们就要辨正地对待。在文化的输出方面，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切不可将中国的文化特色抹杀以迎合西方读者；同样，在翻译西学书籍时，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去接受西方的文本，保留西方的文化。只有这样，我们的译学事业才能得到蓬勃的发展！

目 录

全球化视野中的翻译的文化转向(代序) 1

第一编 中西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研究综述 3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翻译

——安德雷·利夫威尔教授访谈录 17

附:比较文学与翻译导论 31

解构“信、达、雅”:一种经典理论的重读

——评叶维廉《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 42

“异化”与“归化”之辩 51

第二编 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

词、句与话语:当代文学翻译的语言学走向 65

神学翻译: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77

文学翻译中的含混与消解 94

词无定译 译无定法

——评《英汉翻译例句词典》 105

第三编 文学批评与文论

超越批评的批评

——杰弗里·哈特曼教授访谈录	115
文学艺术中的词和意象	
——约翰·贺兰德教授访谈录	136
文学批评与文化	
——彼得·布鲁克斯教授访谈录	143
附:布鲁克斯及其《心理分析的文学批评》	152
比较文学与语言学文论	162
第四编 作品与人物研究	
马利坦的诗学研究	175
鸣响在不同时空的田园曲	
——弗罗斯特与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	193
荒诞的理性和理性的荒诞	
——评托妮·莫里森《心爱的》小说的批判意识	204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	
——梁启超的翻译实践	214
主要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36

Contents

Preface: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Part One Translation Theories: China and the West

1.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a survey
2.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ross – cultural context: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dre Lefevere
3. Andre Lefevere: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4. Deconstructing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re- interpretation on a classic theory
5. “Foreignization”or“domestication”:a debate in translation

Part Two Linguistic Proble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6. Word, sentence and Text: a linguistic tendenc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7. Translation of theology works between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8. The ambiguity of text and its deconstruc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9. Review: On *Dictionary of English – Chinese Translation Samples*

Part Thre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ies

10. Criticism beyond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Geoffrey Hartman
11. Word and images in words and Art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hn Hollander
12.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eter Brooks
13. Peter Brooks and his psychoanalysis in literary criticism
1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Part Four Studies on Works and Authors

15. The poetic studies of Jaques Maritain
16. Pastorals sounding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s: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oems by Tao Yuanmin and Robert Frost
17. Absurdity in reason and reason in absurdity:the critical sense in Tony Morrison's *Beloved*
18. Ideology and Liang Qi – chao's translation practice

Postscripts

Bibliography

第一编

中西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研究综述

一 西方最早的翻译研究

最早的有一定规模的翻译活动从古罗马开始，大量希腊文学作品被译成拉丁语。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戏剧作品被介绍到罗马，对罗马文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发表对翻译的零星见解。比较重要的有西塞罗与贺拉斯的保留原作风格，反对字当句对的理论；以及昆体良提出的译作应“与原作竞争”之说。

古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开始飞快传播，为此目的的宗教教义尤其是《圣经》的翻译迅速发展，一直到目前为止，出现很多重要的译本：古罗马的哲罗姆在大约四〇五年译出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十四世纪英国的威克利夫《圣经》英译本；十六世纪德国路德用民族语译的“第一部民众的《圣经》”；英国的廷代尔从新教徒的立场出发从希腊语译的《圣经》；荷兰的伊拉斯谟刊行的希腊原文与拉丁语译文对照的《新约圣经》的对照本；十七世纪英王詹姆士一世的钦定《圣经》英文译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基督教各派根据原文用现代英语重译的《圣经》。

随《圣经》翻译发展起来的译论，最早的是哲罗姆发表的“文

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以及“不逐字对译”的观点。与之同时的奥古斯丁最早提出翻译的风格取决于译本读者的类别，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并从译词与原词词义的对等来衡量翻译的对等，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学说。他的译论对后世的语言与翻译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十六世纪初伊拉斯谟提出应从原本译《圣经》，译者应学习原本所用的语言；圣经译文应逐字译而译文学作品则应模仿原作风格。十七世纪英国的乔治·坎贝尔首次出版专门论翻译问题的著作《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在这部书中，坎贝尔提出《圣经》的翻译应为文学与宗教两种不同的目的服务，并且首次提出了翻译的三大原则。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的尤金·奈达长期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与研究，提出了极有影响的“动态对等”理论以及以读者反应作为译作好坏的翻译标准。此时翻译理论研究已被纳入新兴的语言学的领域内了。

二 关于诗歌翻译之争

文学翻译尽管在中世纪让位于宗教翻译没有得到什么发展，但最早的翻译活动是从文学翻译开始的，而且在中世纪之后文学翻译一直与宗教翻译一起发展，并且逐步又成为译事主流。英国工业革命后，文学翻译又与宗教翻译和大量涌现的科技翻译平行发展。直到二战后，空前规模的翻译浪潮涌现，翻译规模扩大到各个领域，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共同繁荣，并渐有落后于科技翻译之势。尽管这样，文学翻译研究却一直令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十分感兴趣。

文学翻译又以诗歌的翻译争论最多，译家及理论家往往各执己见，争论不已。争论的焦点通常是将诗译成诗还是散文，应忠于原诗风格与词法还是应灵活处理。在灵活处理的“度”上又

存在“译者可以任意增减原文，按自己的意愿对原文进行再创作”和“译者应忠于原文思想，只改变原文的一些词句”之“自由译”与“活译”之争。最早以诗译诗的译作是古罗马的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用意大利的萨图尼乌斯诗体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这也是最早译成拉丁语的文学作品之一。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塞巴斯蒂安·布兰特进行了类似于双语诗的创作。他先用拉丁文写诗，然后将其译成德语韵文。布兰特认为，只要韵律允许，译诗应采用逐字译法，使译文同样具备诗的特征。苏格兰诗人加文·道格拉斯采用活译的方法译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但他反对过分自由的译法，认为译文应忠于原文。英国的乔治·查普曼用十四行诗体译《伊利昂纪》，用英雄偶句体译《奥德赛》。他在译作的序言中明确提出译诗的原则，反对逐字对译，要求使用最适合译作语言的词法和表达风格、形式来表现和装点译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约翰·德南姆译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采用以诗译诗的译法，译文极为讲究诗的韵律效果，但他认为“在诗中讲究什么忠实性是一种庸俗的错误观点。讲究忠实性，让那些翻译纪实和宗教作品的人去讲究吧”。一六八四年罗斯康门用诗体写了一本研究翻译的论著《论译出的诗》，指出译诗者首先必须是有天赋的诗人，译诗必须选择与自己情趣相投的原作文本。十八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荷马史诗翻译家亚历山大·蒲伯用双韵史诗体译出《伊利昂纪》与《奥德赛》，对后来的译者影响很大。十八世纪末，英国的泰特勒出版《论翻译的原则》，其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谈论了译诗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诗应译成诗，不应译成散文；并且认为译诗的难度没有译散文的难度大，因为译者可有较多的灵活性；但他不赞成无限制的活译。十九世纪英国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从波斯语译了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通过模仿原诗格律，为英语创立了一种新的诗体：由

四行组成，每行为五个音步，第三行不押韵。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译坛围绕荷马史诗的翻译爆发阿诺德与纽曼之争，阐述了许多重要的论点。阿诺德认为应该将诗译成诗，译诗应保留原诗风格，应对读者（主要是学者）产生原作般的感染力；而纽曼则认为荷马是古人，译时应采用古词对古词，“保留原作的所有特征”，应该用一般读者而不是学者的反应来作为衡量译作的标准。他们的争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除了以诗译诗的观点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应用散文体译诗，以便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风格与精神。例如十七世纪末法国的达西埃夫人模仿原作风格用散文译出《伊利昂纪》与《奥德赛》两部史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德国卓越的文学家歌德认为，应该用平易明快的散文体来进行翻译，并认为路德用地道的德国散文体译的《圣经》，比刻意模仿原作更有助于宣扬宗教思想。二十世纪初期，即二战前，西方各国翻译家都开始打破以诗译诗的传统，普遍提倡使用质朴平易的语言把原作译成散文，不译成韵文，即使是翻译历代大诗人的作品，也不采用严格的韵律，以便使译文易被读者读懂。

诗歌翻译尽管多有成就，但仍然只是文学翻译的一部分。下面我们来看看作为整体而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翻译理论的发展。在西方翻译史上，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现了几次高潮。古罗马时期大规模地翻译希腊文学作品这是文学翻译的第一次浪潮。十五和十六世纪遍及西欧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掀起另一场空前规模的翻译浪潮，不仅古希腊作品，而且当时西欧各国的作品也得以大量翻译。十七和十八世纪对古典作品的翻译继续蓬勃发展，到十九世纪翻译重心开始转移到近代或当代作品上来。二战后，各种译作大量出版，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翻译蓬勃兴起，文学翻译成为世界规模的翻译中的一部分。

三 直译/意译与不可译的讨论

文学作品翻译理论的研究也随着一次又一次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的翻译高潮不断深化。尽管二战以前一直缺少译论专著,但也出现过许多影响很大的翻译理论。从古罗马开始就已有“直译”与“意译”之争。意大利诗人但丁在其著作《飨宴》里,第一次提出文学作品不可译论,认为“任何富于音乐和谐感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全部优美和谐感”。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多雷在其著作《论如何出色地翻译》中第一个较系统地提出了翻译理论,对译者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反对逐字对译。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德莱顿提出翻译三分法,认为翻译分为三类:逐字译、意译、拟作。他反对逐字译与拟作,赞成意译。十七和十八世纪译界围绕古典作品的译法出现准确与不准确、厚古派与崇今派之争。厚古派认为应对原作字摹句拟,准确地再现原作风格与形式;崇今派则认为应追求译文风格的优美而不管原作风格如何。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围绕忠实行原文思想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即: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应与原作同样流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可溯自坎贝尔对圣经翻译提出的三原则。它们与我国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八一三年施莱尔马赫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第一次明确提出翻译分笔译与口译,真正的翻译与机械的翻译(即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自然科学的翻译)。他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忠实行原作者,一种是对原作进行改变,使读者更易接受。二十世纪初期德国的沃尔特·本杰明在其论文《翻译的课题》中提出新颖独特的观点,认为译文可译与不